



明代状元与文学

MINGDAIZHUANGYUANYUWENXUE

郭皓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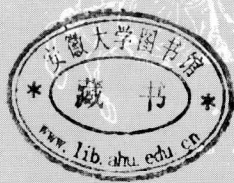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本书由海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本书由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及古代文学学科资助

明代状元与文学

MINGDAIZHUANGYUANYUWENXUE

郭皓政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状元与文学 / 郭皓政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333 - 2418 - 6

I. 明… II. 郭… III. ①状元—研究—中国—明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D691.4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9044 号

明代状元与文学

郭皓政 著

出 版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信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10
插 页	3
字 数	234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418 - 6
定 价	29.00 元

序

陈文新

皓政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状元与文学》即将由齐鲁书社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很高兴就这本书说几句话。

—

关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我一向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仅凭一个大体的印象，便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下判断，作结论；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有学理意义上的同情，尽可能地贴近传统，深入传统，理解传统，这样才能有更深切的体验。多年来，我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着。在指导研究生的时候，我也注意从这个方面启发、引导他们。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我尤其重视这一点。我近年从事的一些研究，如《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中国文学编年史》、《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等，都让我的一些素质较好的博士生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接触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这在加强其文献功底

的同时，也有助于深化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皓政祖籍山东，有着北方人的忠厚和朴实，十分勤奋。2005年夏天，他考入武汉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其时我正在酝酿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课题。经过一年的考察，我决定让他承担《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中的一个子课题，即“历代状元史料汇编”。皓政从明代入手，积累了大量资料，在其师弟甘宏伟博士的协助下，最后编成《明代状元史料汇编》一书。全书共两百余万字，作为《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的一种，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9月出版。在此基础上，皓政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于2008年以校内外评审全优的成绩顺利地通过答辩。本书即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值得关注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皓政能够以“了解之同情”的立场，来认识科举制度，认识状元的文学创作。其次，发掘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不囿于前人观点，对一些新的见解作了力所能及的阐发。下面，我打算就这两点做些具体说明。

二

关于“了解之同情”的问题。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



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①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

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



^① 余秋雨：《十万进士》，原载《收获》1994年第4期。转引自刘华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①“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文天祥是宝祐四年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无懈可击。制度本身只能实现相对公正，不可能做到绝对公正。更何况，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而非法制社会，在这种背景下，要想让科举制度实现彻底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些营私舞弊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科举本身。就其影响而言，正如有阳光的地方总会有阴影一样，科举制度无疑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不应将其负面影响过分夸大。

皓政的这部著作，能够摆脱流行观念的制约，对于科举制度及状元的文学创作，用事实说话，用材料说话，既不彻底否定，也不做夸大、溢美之词。例如，本书的上编《科名与文章》，在论及明代状元的选拔与其文学才能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指出，科举考试是选官制度，特别是明代的科举考试，在科目设置上，只考“四书”、“五经”，不考诗赋，在政策层面上确实存在着轻视文学的倾向，但在明人的观念中，文学才能与状元选拔依然有着密切联系。作者还分析了状元选拔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指出在状元中既有才华卓越之士，也有平庸之

^① 脱脱等：《宋史》卷四一八《列传第一百七十七·文天祥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540页。



辈，这并不奇怪。除了科举制度之外，作者还注意到明代科举制度的延伸——翰林制度对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下编《个性与时代》中，作者具体考察状元的文学创作，注意到时代风气以及作家个性的影响，没有将制度层面的影响绝对化。不论是对科举制度，还是对状元的文学创作，本书的立场和持论都是较为客观公允的。



三

关于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

皓政在编纂《明代状元史料汇编》的同时，完成了他的这本专著。他在史料的钩稽、整理方面用力颇勤，收获不少。例如，他对明代 89 位状元的别集存佚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发现明代状元中，至少有 45 人的别集依然存世。这些别集大部分未经整理和研究，而其中有些作家和作品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其研究价值，一是源于其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思想价值，二是源于其文学史意义。

本书在论及永乐时期的馆阁文学时，将其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以诗歌点缀盛世的“法唐”派，以解缙以及状元胡广、状元曾棨等为代表。另一派是以杨士奇为代表的、以文为主的“宗欧”派，状元陈循为其重要羽翼。作者还指出，茶陵派比台阁体更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其对台阁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诗的方面，而在文章领域，并没有太大发展。“前七子”对茶陵派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文章领域，在诗歌方面，“前七子”倒是继承和发展了李东阳的文学主张。这些见解，有助于加深对台阁体的了解，理清明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就状元文学自身价值而言，有些状元的文学创作颇具审

美价值和思想价值。例如，状元罗洪先是明代著名理学家，以往学界对罗洪先的思想关注较多，而对其文学成就关注较少。本书则对罗洪先的诗歌创作给予较高评价，指出罗洪先虽然不专注于诗歌创作，但当时文坛处于明代“七子”复古运动和唐宋派文风的笼罩之下，罗洪先的诗歌却能够自成一派，实现了诗与思的融合。又如，状元钱福是脍炙人口的《明日歌》的作者，以往文学史对他关注较少，以至于其人湮没无闻。钱福是吴地文人，同时又是茶陵派成员之一，他的诗文创作，体现出吴地文化与馆阁文化的碰撞，对稍后的唐寅也有重要影响。

在对明代状元文学做了大量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本书还从宏观的角度，总结出明代状元文学的发展趋势，即：明前期状元文学主要服务于政治，明中期逐渐关注审美，继而重视思想，晚明状元文学趋向多元化。状元文学受政治影响较大，而与明代文学的整体走向呈背离之势。这些都引发了我们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四

最后，再谈一点感想。

在文学史视野下考察明代状元文学，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纯文学视角，二是杂文学视角。

先说纯文学视角。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大规模地采用纯文学观衡估古代文学，在文学史的撰写中表现出两个倾向：其一，强调诗、文、小说、戏曲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要以这四种文体为主要的叙述对象。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的古代文体被划分到相应的领域，如诗、词、散曲属诗歌，古



文、骈文、小品文属散文，等等。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其二，在著述方式上，强调文学史规律，大量采用现代文学理论的术语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评价，论述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即20世纪初的文学史不太看重绪论、导论之类，20世纪30年代以降，绪论、导论越来越受重视，对文学史的统领作用也越来越强。注重绪论和导论，是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表现。从纯文学视角看明代状元文学，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明代状元文学很少文学史意义。理由是，其一，他们在小说领域基本上没有建树，他们的戏曲创作不成规模，他们的诗多为应酬之具，他们的文章多是实用的产物。其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唐代是诗的时代，宋代是词的时代，元代是曲的时代，明代是小说的时代，而明代状元恰好在小说领域留下了一片空白。这些理由，说来头头是道，但却是用一种理论强行裁剪文学史事实的结果。

再说杂文学视角。明代状元别集的主体部分，以实用性的文体和应酬功能较强的文体（如七律）为主，这似乎就注定了这些作品没有文学史意义。其实不然。清代的沈德潜在编选《清诗别裁集》时，曾致力于区分在酬赠时写诗和将诗作为酬赠之具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沈德潜看来，应酬宴饮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诗人来说，关键问题不是拒绝在诗中涉及酬酢宴饮等内容，而是如何做到在创作中不流于应酬，使酬赠之作具有超出应酬的价值。因此，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的作家作品评议中特别强调赠答、送别诗的“体”、“格”。“时送行诗汇成卷轴，剧多名作，然颂扬得

体，无逾此章。”^①（评吴襄《送徐激斋先辈奉使琉球》）“极乱后宜以宽严相济处之，文翁、武侯其前事也。赠言之体如是。”^②（评严允肇《送宋荔裳按察四川》）“此言抚吴大臣，推周文襄忱、王端毅恕、海忠介瑞，而冀公之追步前哲也。此种立言，得吉甫赠人之体，诗亦穆如清风。”^③（评韩莢《赠江南巡抚汤潜庵先生》）“入山修炼，非儒者事，况有慈亲在耶？送之即以招之，得赠人以言之体。”^④（评濮淙《赠方望子入黄山修炼》）

所谓“体”、“格”，就是身份，就是品格。没有品格即流于应酬，超越了应酬即是得“体”，即是有“格”。沈德潜认为，那些发自内心的酬唱诗与登临凭吊之作一样，是受外物激发而内心有所感触的产物，这类诗作同样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能发挥化导人心的作用；只有那些疲于应酬，随口赠答，并无真情实感的应酬之作，才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对酬酢之作进行取舍时，沈德潜并不只从题材着眼，一概加以排斥，而是着眼于内涵加以选择。

由沈德潜对“体”、“格”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代状元别集中，许多作品的确具有实用和应酬的功能，但实用和应酬不是这些作品的全部价值，在文学史视野下考察

①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33页。

②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③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页。

④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15页。

这些作品，实用和应酬甚至不是这些作品的主要价值，其中颇有一些杰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对明代状元别集的研究还有另一层文学史意义，即有助于我们把握明代的文学生态。20世纪流行的纯文学观，仅以小说、戏曲和少量的诗文流派来建构明代文学史，难免留下很多断层。大量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学史景观被忽略掉了，或视而不见。要想填补这些文学史的断层，仅凭推断和想象是不够的，而应尽可能地走近历史，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重返文学史现场也许只是一种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大量丰富的文学史细节和文学史景观置之不理。认真研究明代状元别集，可以对明代文学获得更多的现场感。在明代这个科举社会的鼎盛时期，不深入考察明代状元别集，对文学生态的了解就可能是残缺不全的。皓政这一部专著的意义，由此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是为序。

陈文新

2010年4月12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上 编 科名与文章	11
第一章 金榜题名：明代状元的选拔	13
第一节 明代状元概况	13
第二节 文学在明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33
第二章 玉堂岁月：明代状元的仕途	55
第一节 明代状元的仕途路线	55
第二节 文学对明代状元仕途的影响	70
第三章 历史回响：明代状元文学概况	78
第一节 明代状元的文学创作概貌	78
第二节 庙堂之音与山林之趣	92
下 编 个性与时代	99
第四章 政治的附庸：明前期状元文学	101

第一节	洪武状元文学与台阁体萌芽·····	101
第二节	台阁体的主流：以文为主的“宗欧”派···	121
第三节	台阁体的支脉：以诗为主的“法唐”派···	129
第五章	审美的追寻：明中期状元文学（上）·····	144
第一节	从状元文学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	144
第二节	台阁体与茶陵派之外的状元文学·····	166
第六章	思想的召唤：明中期状元文学（下）·····	195
第一节	“大礼议”前后的状元文学·····	195
第二节	王学对状元文学的影响·····	217
第七章	理想的挽歌：晚明状元与文学·····	233
第一节	状元焦竑与晚明文学思潮·····	233
第二节	党争影响下的晚明状元文学·····	246
余 论	明代状元文学启示录·····	267
附录一	明代状元别集存佚情况一览表·····	278
附录二	大型丛书中的状元别集·····	291
参考文献	·····	297
后 记	·····	305



引言

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之后，科举制度便成为一幅泛黄的老照片，成为遥远而陌生的回忆。曾经在长达1300年的时间内深刻影响着无数士人生活和灵魂的科举制度，今人已经很难感受到它当初的强大影响力了。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科举时代那一幅幅生活画面，例如，每三年一次的秋闱、春闱，士人们长途跋涉，赴省城、京城赶考……无法感受到科举对士人灵魂的煎熬，它给士人带来的一次次希望和失望。程文、墨卷，这些过去被士人们奉如珍宝的东西，都已成为死去的词汇。但是，科举时代也留下了一些无法抹掉的记忆。比如“状元”这一称谓，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各行各业的第一，都可以称为状元。只是，今天人们口中的“状元”，已被抽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只具有“第一”的含义。那么，历史上的“状元”又是如何呢？

“状元”之称由来已久，它伴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而出现。但“状元”最初只是一种俗称，见于唐代的野史笔记。直到明代，这一称谓始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在许多人的印象



中，“状元”往往与“才子”、“文采风流”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大量有关状元的民间传说，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情节套路，也在强化着人们的这种印象。不过，有人也可能会提出相反意见，认为状元是落后的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特别是明代科举罢诗赋不试，在有些人看来，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状元大概只会做八股文章，满脑子“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心里想的是功名富贵，嘴上谈的是伦理道德，就算偶尔写点诗文，也都迂腐不堪。上述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我们不妨走近历史，了解一下明代历史上那些真实的状元，探寻一下他们文学创作的真相。

—

明代，中国科举社会进入鼎盛阶段。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它始于隋大业元年（605），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始告终结，时间跨度长达1300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科举制度不断趋于完善和严密，影响日益扩大。至明代，科举的触角已延伸至政治、教育、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深刻地影响着士人的思想和灵魂。清代科举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代。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明清文学的时候，有必要对科举予以适当关注。

从科举视角研究文学，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开风气之先的著作，他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后来研究各时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具有示范意义。在他们的影响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科



举与文学的关系，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不过，目前，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多集中于制度史的研究层面，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傅璇琮先生早已指出：“我们似应该把视野放开些，不能只停留在说明考试办法（如试诗赋、策文等）对文学的影响上，单纯以下个积极或消极的结论为满足，可以把科举制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的课题，进行较为全面的、历史的考察。”^① 这一点对明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而言，尤为重要。由于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较为隐蔽和复杂，我们既要从制度方面进行考察，也应关注那些有着特殊科举身份的文人（例如状元、榜眼、探花、会元、庶吉士、解元等等）的文学创作成就，以此验证我们对科举制度所下的结论。本书研究明代状元与文学的关系，即是在一方面所做的初步尝试。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由于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状元文学研究长期处于被遮蔽的境地。除少数状元（如明代的杨慎、康海等）外，大部分状元及其文学创作鲜为人知。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对状元作整体考察的著作出版了不下 30 种，数量虽然不少，但绝大部分以普及历史知识为目的，注重趣味性，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化。就创作而言，状元的八股文、策论相对受到重视，诗文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对明代八股文发展史作了梳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八股文名家，其中提到的明代状元有商辂、钱福、罗伦、吴宽、文震孟、周延儒等。李维新等主

^①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6 页。